

中国外交官

ZHONGGUO
WAIJIAOGUAN

手记

下

SHOUJI

李同成 主编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李同成主编

手记

下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
WAIJIAO GUAN

SHOU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交官手记 / 李同成主编.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1.6

ISBN 7-80610-976-5

I. 中... II. 李...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874 号

中国外交官手记

(上、下册)

李同成 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29 印张 4 插页 692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10-976-5/I·190

定价:(上、下册) 58.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冰冻岁月

——我驻苏联大使馆纪事

李同成

1975年1月4日，我和夫人雪白乘火车离开我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直接赴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火车运行两天两夜，于1月6日到达莫斯科。大使馆政务参赞马列和领事郭育山到车站迎接我们，到达使馆后，刘新权大使和夫人黄友辛以及其他熟悉的同志都来看望我们，见面之际，热情洋溢，像一股暖流充满全身，我深信在这里工作一定十分幸福。

“感谢赫鲁晓夫为我们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大使馆”

我国驻苏大使馆地处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遥遥相望，大使馆门口的一条马路，在我建馆之后取名为“友谊街”，象征中苏友谊。大使馆面积12公顷，是莫斯科最大的一座使馆，大使馆主楼是一栋8层高楼，这是大使馆的办公楼，大楼东西两侧各有两座楼，主要供使馆人员住宿和附属单位使用。与主楼正门相对，是等候厅，等候厅高约20米，装有大型吊灯，地面铺的是褐色大理石，打开灯光，开阔明亮、庄重美观。每逢国庆、建军节等大型招待会，客人通过主楼进入等候厅，待主宾到达，然后进入宴会厅。宴会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轩敞高雅，宽敞明亮，四壁对称地悬挂着我国国画大师齐白石和徐悲鸿的屏条，窗前摆放着几盆

精巧苍劲的盆景，和那青铜古鼎、翡翠花瓶配置一起，色彩调和，格调优雅，情趣盎然，可容纳 1000 多客人。宴会厅的右侧，是仿造颐和园建筑的一座客厅，地面和墙壁全是白色大理石。正前方有一水池，池中有山有水，山上有鸟，水中有舟，两侧雕梁画栋，来到这里仿佛置身北京的颐和园，别有一番情趣。

宴会厅西侧是宽敞的平台，站在这里举目远望，正前方是一座宽约 10 米、长约 30 米的人造湖，湖的西侧是人造假山，山上有挺拔的白桦树和笔直的落叶松，长得异常茂密，呈显盎然生机。向北望去是苹果园，那一棵棵枝叶茂盛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树枝都被压弯了，有些树枝不得不用木杆撑着，以防被压断。大使馆举行活动，有时带客人漫步于苹果园中边采食苹果，边欣赏美景，微风吹拂，醇香扑鼻，夹杂欢声笑语，使人心旷神怡。

中国大使馆是莫斯科的景点之一，经常遇到苏联游客在使馆门前徘徊观望，有些人提出到使馆参观。我们一般不接待，这不是使馆的任务，但个别情况例外。有一次遇到一位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孩在大使馆前徘徊，她看到我，亲切地问道：“同志，我可以到大使馆看看吗？”我告她：“对不起，使馆不接待游客。”她以恳切的口吻向我说：“我不是游客，我是来自格鲁吉亚，来自斯大林的家乡。我和我的两个孙子刚才到斯大林的陵墓前献鲜花，听说中国大使馆非常漂亮，想进去看看。”我一听这话，怦然心动，仔细端量她，只见他们胸前佩戴着斯大林的像章，以恳切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好！”于是带他们从正门进入，穿过等候厅。他们一边看，一边问，赞不绝口，当走到“颐和园”时，她的两个孙子要拍照留念，我帮助他们拍照，将他们三人的形象不但留在底片上，而且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中国大使馆建于 50 年代初，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牢不可破”时期，赫鲁晓夫曾向我们大夸海口，一定为中国建筑一座最

漂亮的大使馆，有关部门正是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建成我们的大使馆，刘大使笑称：“我们在莫斯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座漂亮的大使馆可不能忘记赫鲁晓夫的功劳。”

“红场丢人”事件

我国驻苏大使馆，是中国人赴拉美、西欧、北欧和非洲的中转站，国内每周有一列火车和飞机从北京开往莫斯科，不论火车或飞机都有中国乘客，他们到莫斯科一般都住大使馆，然后乘飞机或火车分赴目的地。对大使馆来说，每周迎来送往是项特殊的任务，因而大使馆有一个迎送组，专门承担这项工作。

初到莫斯科的人，一般都要求出去看看，在莫斯科停留时间较长的人，可以带他们多看几个地方；有的在莫斯科停留时间很短，头天到达，第二天就要转机或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大使馆为了照顾大家，只带他们到红场看看。

红场是莫斯科的中央广场，是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庆典活动的中心，著名的列宁墓就在红场中央，它是世界各国人民崇敬和向往的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神圣之地。正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如果一个人来到北京，不到天安门广场看看，会成为一大遗憾。大使馆对过往客人，一般只要时间来得及都要带他们到红场看看。客人到达使馆后，一般不等他们提出，就在招待所的黑板上发出通知，几点从楼前乘车参观红场。

大使馆没有配备导游，迎送组的人，因为每周都要去红场，对红场的情况已了如指掌，送客人参观红场的汽车一开动，迎送组的同志便拿着一个麦克风向大家介绍红场情况——

红场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每天从苏联全国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人总要参观红场。但红场并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早在 15 世纪末就形成了。当时沙皇伊万三世下令把这里的建

筑物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商业区，叫做托尔格。1571年，发生了一场大火，把这里的所有建筑物全部化为灰烬，出现了这块空地。16世纪时，这块空地因附近有座特罗伊茨教堂而称特罗伊茨广场，到19世纪时，这块空地才改名为红场。

红场南北狭长，约695米；东西较窄，只有130米，总面积不到10万平方米，如果和我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相比，她只有天安门广场的一角。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红场不断有新建筑出现。15世纪克里姆林宫墙，沿红场西侧隆起，斯巴基和尼古拉两座城门塔一南一北，像威严的卫士，守卫着从红场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两个通道。16世纪，红场南侧建起了被称为俄罗斯艺术杰作的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在教堂的东南部，有一个面积只有几千平方米的白色圆形高台，这里是历代沙皇和教会头面人物向人们发表圣示和发布诏书的地方，因为沙皇在这里对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处以死刑，人们为纪念拉辛便把这个高台叫做断头台。

红场北侧，是苏联历史博物馆，它和勃拉仁内大教堂遥遥相对。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从建筑的整体结构到每一个局部设计都独具匠心，体现了俄罗斯的建筑风格。

客人来到红场，一般都是先瞻仰列宁墓，在这里有苏联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浩浩荡荡，川流不息。每当斯巴基城门楼上的自鸣钟逢整点发出嘹亮悦耳的钟声时，从城门楼下的大门走出3名仪仗卫队的士兵，一前两后，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列宁墓走去。陵墓入口处每小时举行一次庄严的换岗仪式，这已成为红场的一景。每天清晨参观列宁墓的人，就开始在红场北侧亚历山大花园入口处排队等候，一年四季，无论风和日丽，还是风雪交加，这支队伍都是很长很长，一眼望不到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身佩红袖章维持秩序的人看到我们总是很客气地说：“你们是客

人，可以先进去！”

黑色和深红色大理石结构的列宁墓庄严肃穆。1921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由著名建筑师舒谢夫设计，临时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陵墓，安放盛殓列宁遗体的水晶棺。1930年仍由舒谢夫设计才改建成大理石结构。列宁墓总面积5800立方米，黑色代表人民对列宁的无尽的哀思，深红色代表在列宁的旗帜下继续革命。陵墓正面上端是俄文列宁的名字。入口处，两名战士站在两侧，神情凝重，相对平视，纹丝不动，在柔和的灯光下，列宁静卧在水晶棺内，面容平和安详，仿佛正在睡眠。

瞻仰列宁墓后，便分散活动，约定集中地址和开车时间，分散活动时间一般两个小时。这时有的拍照，有的走近红场周围的各大建筑进行参观，还有的到红场东侧莫斯科中央百货商场参观、购物，这是莫斯科最大的商场，营业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雄伟壮观，成为红场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途经莫斯科到红场参观者不计其数，从未发生过问题，迎送组的人也就有些大意，1978年8月23日，发生了问题，使大使馆一场虚惊——

这一天，大使馆迎送组从火车站迎来27名从莫斯科转机飞往非洲扎伊尔、乌干达、尼日利亚的三个专家组，他们到达使馆安顿好后，于当日下午2时带他们到红场参观，和以往一样带他们先瞻仰了列宁墓，然后约定4点半在东侧停车场集中返馆。这时迎送组的人和司机，一般都坐在车厢内等候，按照约定时间，大家都纷纷提前返回，迎送组的同志一看表，时间到了，问大家：到齐了吗？只听大家参差不齐地答道：到齐了！于是司机便开车，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使馆。

三个专家组虽然同住一座楼，但每人有自己的房间，只是到6点钟开饭时，大家在餐厅会面。这时只见乌干达专家组的组长急

冲冲跑到迎送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组有位姓王的工程师不见了！”人丢了，事关重大，迎送组急忙向刘大使报告。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不好，弄不清是到红场参观把人丢在红场，还是被苏方绑架。刘大使命令迎送组全体马上出动，分乘两辆车到红场寻找，如果找不到拟向苏方提出交涉。红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迎送组的两辆车到红场后，一辆停在东边，一辆停在西边，分头找，原来那位姓王的工程师，只顾观西洋景，忘记了返馆的时间，当他来到停车点时，汽车已经走了，他孤身一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候使馆来人找他，他见了迎送组的人几乎要哭了，他说：“可把我急死了！”

此事发生后，迎送组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他们工作中的疏忽。刘大使指示，我们在国外工作，事事、时时都要小心、谨慎，绝不能马虎，我们使馆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应该的，今后不仅迎送组要记取教训，大家都要记取教训。路过我们这里的人很多，无论哪个部门的客人外出都要精心安排，负责到底，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红场丢人”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大家从中记取教训，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一个人在大使馆工作，会有一种荣誉感，男士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女士们珠光宝气，云鬓高耸，至于待遇远远超出国内则更不待言。这是他们风光的一面，但还要看到他们的另一面，那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

每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初到国外一切感到新鲜，似乎无暇他顾，可是时过不久，便开始思念祖国，想念亲人，大家会心照不宣地汇成一种共同的感情——想家。

驻苏大使馆共 100 多人，来自祖国各省、市，一般两年休假，四年轮换，在大使馆想见到自己的亲人一般是不可能的，但要见到自己的老乡，那是很可能的，每年途经莫斯科分赴世界各地的人很多，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大使馆的人员对途经莫斯科的人经常打听：“你是来自哪里？”因为过往的人每年络绎不绝，所以同省市的人有时会在使馆相遇，他们见面之际，感情溢于言表，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心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那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厨师班有位陈师傅，来自上海，他是第一次出国，说一口浓重的上海话，喜欢和别人聊天，但别人对他说的很多话听不懂，为此他感到苦闷。

有一次，一位在乌干达工程队任电工的上海人，途经莫斯科回北京，饭后，在院子里边散步边和别人聊天，他虽然在讲普通话，但一听就能听出浓重的上海口音，陈师傅便搭讪道：

“依哪里人？”

“啊拉上海人。”陈师傅一听这话，真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啊拉也是上海人。”他接着问道：

“依贵姓？”

“免贵姓陈。”

陈师傅一听这话高兴极了：“咱们不但是老乡，还是同姓！”便情不自禁地向前把那位上海人抱到怀里，于是两人便叽里哇啦说开了上海话，两个人越说话越多，越说越热情，陈师傅便把他带回自己的宿舍，又沏茶，又点烟，两人再聊了起来。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不错，此时此地的两位陈师傅，真是如贫捡宝，如暗提灯，如饥得食，如旱逢雨。这可能是他们一生最快乐的时刻，他们从晚饭后一直说到深夜，两人

才各回宿舍入睡。

第二天，下午2时，那位上海的陈师傅要乘火车回国，早餐后大使馆的那位陈师傅带了一盒果脯、一包花生米和一大包食品到招待所看望老乡，两人又是一番愉快的交谈。并告：下午我到车站为你送行。

一人在国外工作几年，回国时好像老鼠搬家，每个人都有几个箱子，加上为别人带些东西，一般都要超重，好在所乘的是我们国家的火车，当时乘客也不是太多，列车对中国人回国多带些东西，一般都放得比较宽。每班火车少者十几人，多者上百人，大使馆到火车站送人，有时开大轿车，人多时还要专门开一辆货车拉行李。

为了帮助大家搬行李，大使馆多年形成一种习惯，客人临行时，一般是熟人送熟人，老乡送老乡，如果有的乘客在大使馆既无熟人又无老乡，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就要派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车站帮助搬行李。

这次去车站，陈师傅早来到招待所门口等候上车，为上海老乡送行。到车站后，陈师傅好像有浑身的劲没处使，今天找到了使劲的地方，一趟又一趟向车厢搬东西，只累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把上衣脱下，交给一位女同志拿着继续搬，东西搬上后，两人又费了一番劲，把行李摆弄顺，这时两人走下车厢，从那位女同志手中取过上衣穿上，拥抱，道谢，告别。

汽笛响了，火车徐徐开动，陈师傅跟着列车挥手相送，直到火车走远了，他才回来，和大家一起乘车返馆。陈师傅回到寝舍后，一摸口袋有一本护照，一看名字，是他上海老乡的护照，原来是在车站从那女同志手中取上衣时张冠李戴。他们两人的上衣都是黑色中山装，大小又一样，当时两个人都没发现穿错，回到大使馆后才发现，这时火车已驶出几百公里。陈师傅急忙向迎送

组报告，迎送组感到事关重大，一个人没有护照，如何过海关，过不了海关又怎么办！马上向刘大使报告，刘大使一听紧皱眉头：怎么能发生这样的错误！当即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派两名外交官乘飞机到伊尔库茨克，按路程计算，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需要3天时间，而乘飞机只需4个小时便可到达，这两名外交官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趋车到火车站，等候火车到达，待从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进站，他们便登上列车，找到那位上海人，将护照交给他并将衣服换回。这三天时间，不知那位上海人是如何熬过的，只见他双眉深锁，满面愁容，紧握两位外交官的手，连声道谢，眼泪簌簌地洒在地上。

此事发生后，大使馆虽未对陈师傅进行批评，但他自己感到内疚，见人就说，我犯了个错误，给使馆造成很大浪费。陈师傅到车站帮忙，可把大使馆的人忙坏了，真是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设席容易请客难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要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与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我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有理、

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了神经，便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看样板戏事件。

1971年1月，大使馆决定以刘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9日到使馆观看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使馆得到苏方答复后，便积极准备，但2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当即请示我国外交部取消这次招待会。9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电复同意使馆意见，大使馆遂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刘大使并抵制了苏联外交部为使团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节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这对刘大使来说实在是艰苦的任务，每次出席这

类活动都十分紧张，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是否退场，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刘大使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有一次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当众昂首走出会场，返馆后，当即把刘大使退场事电告外交部。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11月6日苏方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红军老战士，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如一日，他看到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此事才算了结。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与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瞋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另是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修理暖气，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去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 80 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 60 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时间一天天过去，星期六到了，下午 5 时我们早早就把食品摆到宴会厅，各种饮料一应俱全。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提前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来一个人，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工人来我馆干活，我们问道：“星期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句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防暴大演习

1969 年 3 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莫斯科和北京都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和窗口的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在八楼，通

过窗口拍照，留下当时的场景作为历史资料。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状，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级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之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大使到任前，大使馆趁机打扫卫生，对馆内外进行整修，我们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垃圾。这时苏方表现尚好，经交涉，很快派人出动云梯，用化学剂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大使馆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际，对方向我表示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虽寒乍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1974年1月，两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报复。

果不出所料，当月19日，我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关恒广离开莫斯科

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对着话筒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为了防止苏方报复，大使馆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了一次防暴大演习，这是大使馆一次重大行动，全馆人员上至大使下至每个馆员，全都参加了这一行动。防暴指挥部设在三楼会议室，刘大使挂帅，政务参赞、商务参赞、武官为指挥部成员。

馆员分编为 6 个组：

对外组，在暴徒冲击使馆时，向苏联外交部进行交涉；

救护组，负责包扎、救护受伤人员；

交通组，听候对外组召唤随时准备出车，到外交部进行交涉和准备运送伤员；

巡逻组，每人持一木棒，沿使馆周围巡逻，发现暴徒越墙进入使馆时进行阻击，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

保卫组，主要保卫使馆机要，这个组由 20 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它和巡逻组分工不同但任务大致相同，这两个组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巡逻组阻击暴徒进入使馆。第二道防线由保卫组 10 人坚守主楼楼梯，阻击暴徒上楼，一旦暴徒冲破第二道防线，进入主楼，便由保卫组的另外 10 人与暴徒进行血战。机要室一层有一道铁门，门内堆满酒瓶子，如果暴徒冲击铁门，先用酒瓶子砸，若铁门被暴徒破坏，便用棒狠狠还击，与暴徒进行生死决斗，保卫组同志齐声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机要室。

一切准备就绪，下午 2 时整，拉响电铃全馆同志各就各位进行实战演习，每位同志都很认真，从大家的情绪看如同一场实战。大演习进行了一个小时，3 时整拉响二次电铃，大演习结束。